

近代军阀的鼻祖——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字子黻、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其父李文安，清同治年间曾任刑部郎中，记名御史；母沈氏，生子四人，名瀚章、鸿章、鹤章及昭庆，鸿章排行第二。李氏父子皆因镇压人民起义有功，得到清廷重用，是清朝末年烜赫一时的人物。

李鸿章二十一岁（1844年）中举，次年即前往北京，投奔曾国藩。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他借着这层关系，“从曾国藩游，讲求经世之学”。

一八四七年，李鸿章以进士入翰林，时与郭嵩涛、沈葆楨、李宗羲被称为“丁未四君子”。他们都是曾国藩的门生，深得曾的赏识。尤其是李鸿章，以后长期追随曾国藩，由于曾的提携，最后终于爬上北洋大臣的宝座，成为清末最大的汉族官僚。

李鸿章作为近代军阀鼻祖的出现，是当时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已经日渐没落，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十九世纪以来，英法俄等西方帝国主义大举侵入中国，更加剧了中国社会原有的各种矛盾。中国人民在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国内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榨之下忍无可忍，终于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爆发了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革命。这次革命动摇了清朝封建统治的根基，直接威胁着清王朝的生存，成

为清王朝统治集团的心腹大患。但是，当时清王朝所掌握的主要军队——“八旗”和“绿营”腐败不堪，毫无战斗力，已经无法用来扑灭这场人民革命运动。为了解除太平天国起义所造成的严重威胁，清廷任命一些官僚，分赴各地募练乡勇。由此组织起来的乡勇，后来成了镇压太平军的主力。

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这些统兵官僚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手握重兵，慢慢地便成了拥兵割据的军阀。他们是近代中国军阀的鼻祖。当时最出名的军阀军队是曾国藩所练的湘军和李鸿章创练的淮军。湘军和淮军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军阀军队。

李鸿章凭藉淮军这支反动军队，在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中为清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受到了清王朝的赏识和重用。从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七〇年，短短的八年中，他由江苏巡抚升署两江总督，实授湖广总督，最后更一跃而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掌握着清王朝的军事、外交、内政等大权。他在天津所设立的衙门，实际上成了清王朝的“第二中央政府”。

中日甲午战争前，李鸿章的权势达到了全盛时期。他在大力培植淮军的同时，又创办北洋海军。为了保证这些军队的军火供应，他开办了许多军事工厂，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势力与地盘，影响所及，达于长江、黄河两岸。

甲午战争中，这支专门用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的军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淮军被击溃，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为这支队伍服务的军事工业亦因腐败落后的封建管理制度而处于奄奄一息的地步。自此，李鸿章开始走“下坡路”，“威风”一落千丈。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大举侵入中国，中国社会逐步走上殖民地化的道路。在帝国主义的培植下，在封建统治集团内

部产生了一批专门仰承帝国主义鼻息的封建买办官僚。李鸿章即是这种封建买办官僚的代表。在他主持清朝外交工作的几十年中，他极力推行一条卖国投降路线，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肆无忌惮地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

李鸿章一生的历史，是一部镇压人民起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历史。但就是这个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反动头子，却被中外反动派誉为“李文忠公”。外国资产阶级和国内地主买办阶级的“史学家”们，故意歪曲历史，往李鸿章脸上涂脂抹粉，把他描述为一个“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吹捧他“独主国事数十年”，“名满全球”，“中外震仰”，是所谓“近世所未有”的人物。因此，揭露李鸿章一生的真实历史，还他以本来面貌，是非常必要的。

一、曾国藩的得意门生

曾国藩对李鸿章十分赏识和器重，称赞他“才可大用”；李鸿章对曾国藩亦十分推崇。一八五八年冬，李鸿章离开安徽巡抚福济的军营，跑到江西建昌，加入了曾国藩的幕府。开始，他帮助曾国藩草拟文稿、奏章，经过一段磨练以后，曾即委以重任，让他参与重要军务。不久，曾国藩把李鸿章推荐给咸丰皇帝。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摺中，曾说：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堪膺封疆之寄”，请求咸丰皇帝授于李鸿章地方实权。奏摺上呈不久，咸丰皇帝死了，此事暂时被搁置起来。一八六二年，慈禧听政。这时，太平军由江西攻入江浙，席卷江南财赋之区。以慈禧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十分惊恐。为了确保江南财赋来源，慈禧命令曾国藩保荐

人员，充任江苏巡抚。曾国藩一面再度保荐李鸿章充任江苏巡抚，一面命令李鸿章赴安徽庐州招募淮勇。李鸿章回籍后，纠合豪绅地主，于短时间内即招募淮勇五营。同时，曾国藩又拨湘勇数营给李鸿章，并派湘军名将程学启归入李鸿章麾下，帮助李鸿章按湘军营制训练淮勇。是年二月，淮军训练告成，便立即开赴上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四月二十五日，慈禧正式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

李鸿章以一个幕僚的身份，在短短的四五年间即登上江苏巡抚的宝座，成为手握兵权的地方大员，以后更一帆风顺地成了当朝宰相，这一切与曾国藩对他的提携和栽培当然是分不开的。

在李鸿章追随曾国藩的长时期中，李曾之间也曾出现过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特别是在李鸿章羽翼逐渐丰满以后，他们之间曾因争权和争宠而时相径庭。但是，李鸿章终其一生，无论在坚决与人民为敌，残酷镇压历次人民革命运动，死心踏地作清王朝的忠实奴才方面，还是在屈辱投降，崇洋卖国，忠实地充当外国侵略者的走狗等各个方面，都始终没有丝毫违背他的那位老师的教导。在这些方面，他倒是常常超过了他的老师，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二、疯狂镇压人民革命

李鸿章的一生是镇压人民革命的一生。他所统率的淮军，主要任务就是镇压人民起义。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他同曾国藩、左宗棠等军阀头子一起，先后镇压了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极力为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统治而卖力。

（一）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李鸿章投奔曾国藩幕府之前，曾于一八五三年受命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回安徽原籍办团练，后来转入安徽巡抚福济军营。从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八年间，他曾几次领兵与太平军在安徽作战，都被太平军打得丢盔卸甲，最后全军覆灭，他自己也差点丧了命。因此，这个以绞杀人民革命为己任的刽子手，对人民的革命力量是十分清楚的。一八六二年，当他率淮军进驻上海，担负江苏战场同太平军作战的任务时，即深感淮军力量远不足以抵御太平军。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只有依靠外国侵略者的力量，这就使他一开始便走上了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本国革命的道路。他一面同外国“洋枪队”配合作战，进攻太平军；一面高价向外国商人购买军火和军工机械，聘请外国军官教练淮军枪法。这样，没有多长时间，淮军实力迅速增长，很快地便成了长江下游同太平军作战的主力。

为了勾结外国侵略者和他一起镇压太平军，李鸿章卑躬屈膝，完全暴露了一个买办军阀的奴才面目。李鸿章这种卖国行径，是和他的老师曾国藩的教导分不开的。开始的时候，李鸿章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他所带领的淮军，刚到上海时衣帽粗陋，外国人很瞧不起；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外国主子颐指气使，呵斥相加，淮军常受欺凌，有时甚至弄得李鸿章也很难堪。李鸿章一度曾为此感到不安，于是便写信给曾国藩，向老师求教。不久，曾国藩来信告诉他：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行，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两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

曾国藩深怕他的徒弟听不懂这套“忠信笃敬”的鬼话，因

此常以一些事实来启发和开导他。不久以后，当外国洋枪队在一次战斗中被太平军击败逃走时，李鸿章的淮军恰巧赶到；淮军在这场战斗中侥幸获胜。曾国藩得到这个消息，便连忙写信给李，告诫李鸿章“千万不要引起洋人恼羞成怒”。他说：“吾辈惟谆诫各将士，以‘忠信笃敬，四字为主’，千万不要得罪洋人。”

由此可见，所谓“忠信笃敬”，就是要奴才们在任何情况下，对于洋主子都要采取奴颜卑膝的态度，用忍让和屈辱来换取洋主子的欢心和支持。李鸿章很快便接受了他老师的这套奴才哲学，并在自己后来的一系列活动中，把这套奴才哲学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

李鸿章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低声下气，但对于本国人民，对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却完全是另一副面孔——一副嗜杀成性的刽子手面孔。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长时期中，他对太平军将士的主要办法就是“杀”。每次作战，他都要大开杀戒，不仅要杀太平军的将士，也要杀无辜的老百姓，并藉此向清廷报功。一八六三年十二月，李鸿章攻打苏州时，曾企图将苏州城内十余万太平军和老百姓全部杀绝。即使对于被他诱降的太平军降将他也不放过。一八六三年，他曾一次杀死太平军降将郜云官等八名，随侍卫队一千余人。这件事甚至连吹捧他的梁启超也不得不说李鸿章是“有惭德”。

李鸿章不仅自己拚命屠杀人民，而且唯恐杀得不够，还鼓励外国侵略者杀中国人民。一八六四年四月，英国的“常胜军”与淮军围攻常州时，戈登兽性大发，曾对李鸿章说：“城内两广人（系指太平军中的两广人）必须杀尽。”李鸿章当即表示欣然同意，并上奏慈禧说：“戈登近日颇顺情理，……与臣意见

相符。”所谓意见相符，即共同屠杀中国人民意见相同。可见戈登与李鸿章都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凶恶的刽子手，他们是一丘之貉。

李鸿章和外国侵略者，每占领一个城市和村镇，便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淫、掠。人民饱受兵燹之苦，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农村到处呈现一片荒凉破败景象。以致李鸿章自己也不得不供认：“查苏省民稠地密，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今则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间有破壁颓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询其生计，则云近地无可求乞，远地不能行走，唯掘草根作饼充饥。”这种悲惨状况，不正是李鸿章的淮军与外国侵略者的“洋枪队”所践踏、蹂躏的结果吗？

一八六四年南京被陷，太平天国革命终于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一些主观方面的原因而失败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李鸿章以“平吴大业”进一步得到清廷的赏识。在论功行赏时，李鸿章被封世袭一等伯，他所掌握的淮军这时也壮大起来，人数由原来的六千余人迅速扩充到七万人左右，成为当时军阀军队中最大的一支队伍。

（二）镇压捻军起义

镇压太平军以后不久，李鸿章又开始向另一支人民革命武装——捻军发起进攻。一八六六年冬，清廷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而以李鸿章署理钦差大臣，代替曾国藩“剿捻”。李鸿章争到镇压捻军的指挥大权，欢欣不已，立即表示他对于剿捻一事“责无旁贷，不敢有所推诿”。

捻军是山东、河南、安徽等省的一支农民起义武装，是太平军的友军，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在李鸿章担任镇压捻军钦差

大臣之前，清廷先后派遣平捻统帅二十二人，都未能将捻军镇压下去。一八六五年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在山东被捻军击毙，清廷震动。这时，曾国藩亦束手无策，清廷遂改派李鸿章督师剿捻。应该说，这是清王朝对李鸿章的最大“信任”。

李鸿章总结了前二十多任统帅失败的教训，认为捻军能长驱直入，纵横无阻，是因为马队多，采取流动游击战术。于是，他立即派人到东北、蒙古购买战马，日夜加紧训练马队。他又向外国侵略者购买“马上双响短洋枪”，企图以马队加外国新式武器，迅速将捻军镇压下去。但是捻军勇敢善战，刚训练的淮军马队根本无法抵挡，结果仍然屡战屡败。德安一战，张树珊部全军覆没，张树珊亦当场毙命；罗家集战役中，郭松林身中七弹，差一点儿作了捻军的俘虏；尹隆河战役中，刘铭传部大败而逃，伤亡惨重。张树珊、郭松林、刘铭传都是淮军主要将领，他们的失败，使李鸿章焦虑不安、忧心如焚，他在给慈禧奏本中，不得不承认“军务愈办愈坏”。

淮军节节失败，李鸿章不得不改变战术。他认为捻军是“流寇”，要战胜它，就要“逼之不流，然后会师合剿，乃为上策”。于是，他决定扼守黄河、运河，诱引捻军于山深水复之中，然后动员河南、山东等省的全部兵力，妄图一举扑灭。然而这套战术在捻军的打击下仍然归于失败。一八六七年七月，东捻军进占运河沿岸，数日之间便抢渡运河，进入山东，粉碎了李鸿章的阴谋诡计。李鸿章败守胶莱河后，又企图把东捻军围困在登州、莱州一带，使北不得进畿疆，南不得蔓延淮南。但是不久以后，东捻军强渡潍河，李鸿章的计划又告破产。最后，李鸿章使出了反动派惯用的卑鄙手段，用二万两白银收买东

捻军叛徒潘贵升，致使东捻军领袖之一的任柱于一八六七年十一月遇害牺牲。这时，东捻军之势大衰，西捻军又远在西北，呼应不灵。一八六八年一月，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 被俘牺牲，东捻军遂全部溃散。

在东捻军危急的时候，西捻军首领张宗禹曾率部由陕西攻入山西，力图牵制清兵，以解东捻军之危。一八六八年二月，西捻军进入直隶，威逼京城，清廷最高统治者非常恐慌，下令李鸿章、左宗棠等合力围剿。李鸿章采用坚壁清野办法，强令直隶全省修圩筑寨，断绝西捻军粮草，使西捻军在直隶无立足之地。西捻军遂于同年四月冲破清兵的重重封锁，强渡运河，转战于运河以东地区。李鸿章再度扼守运河和黄河，逼西捻军南下。西捻军虽奋力苦战，但终因孤军无援，最后亦告失败。

镇压西捻军后，李鸿章被招回京，复任原职，并“加太子太保衔，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赐紫禁城内骑马”。自此，淮军势力进一步得到发展，几乎遍及直隶、山东等省，并控制了黄河、长江一带。一八七〇年李鸿章又由湖广总督一跃而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集外交、军事、内政等大权于一身，成为当时不可一世的人物。

三、洋务运动中的核心人物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兴起了一场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兴起，表明以清政府为首的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在内忧外患

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赖文光加入捻军，成为东捻军的重要将领之一。

的双重威胁下，已不能再照老办法统治下去了。于是，统治集团中的明智派，企图移植西方近代生产技术，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以便挽救清廷垂危的命运。李鸿章就是这场洋务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他的洋务活动大体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创办军事工业

李鸿章是在镇压人民起义过程中加入洋务运动的。他办洋务的目的完全是为镇压革命运动服务的，因此，这所谓洋务，主要是军火工业。一八六二年，他率淮军进驻上海后，在“效洋人步伐，操练洋枪队，平中国之‘贼’”的同时，即招募英法两国兵匠，设立“制炮局”，制造“开花炮”、“自来火”等件，用来屠杀太平军。一八六五年，他又购买了一座洋人机器铁厂，和上海制炮局合并，改称“江南制造总局”，仿造洋枪、洋炮、洋船。

一八六七年，李鸿章将苏州炮局迁往南京，改称金陵机器局，专门从事军火生产。这是一个真正的兵工厂。

一八七〇年，李鸿章接办天津机器局，并在原来基础上扩大成东西两局，东局制造火药、铜帽、枪炮、水雷及各式子弹；西局制造开花子弹、军用器具。

李鸿章办的这些工业，生产了大量的杀人武器，源源不绝供给淮军屠杀人民。

（二）创建北洋海军

为了保持北洋地盘，巩固淮系的势力，李鸿章下决心建设一支海军。一八七一年他开始在大沽筹建新式炮台。他用兵工厂制造的大炮，以及向外国购买来的其他新式炮火武装这个炮台，使大沽炮台成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炮台。接着，他又用巨款向英德购制铁甲兵船，训练海军。从七十年代初到一八八八年北

洋海军初步建成，前后共经历了十五年时间。这时，北洋海军拥有主要舰只二十二艘，已经是一支初具规模的海军力量。

李鸿章把北洋海军看作是自己势力的重要部分，是洋务建设中的“命脉”。北洋海军建成后，李鸿章曾经得意洋洋地吹嘘说：“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这当然是骗人的鬼话。实际上，正如他所创办的其他军事工业一样，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和海防建设，都是用来镇压人民反抗和巩固淮系势力的工具，李鸿章从来就没有用它来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打算。

（三）围绕军事工业建立的其他的企业

李鸿章为了发展本集团的经济势力，解决军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和巨额经费，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还创办了一些新式民用工业，并参与开采矿产与修筑铁路等活动。他所办的企业大体情况如下表：

时间	企业名称	地址	经营范围	其 它
1865	织造机房	南京	生产绸缎	不公开出售，仅供贵族官僚消费用
1872	轮船招商局	上海	经营轮船运输	官 督 商 办
1877	开平矿务局	天津	勘察、开采矿产	1881年该局修筑铁路二十里后又延长六十里，1888年又修筑天津至大沽铁路
1880	电报总局	天津	从事电报通讯	
1882	机器织布局	上海	生产布匹	官督商办，资本为四十万两
1887	漠河金厂	黑龙江	冶炼金矿	官督商办，股本为二十万两

李鸿章建立的这些民用工业，大多数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带有严重的弊病。

首先，官督商办企业由商人提供全部或大部资本，而由政府派来官僚进行管理。这些官僚根本不懂得业务，但大权在握，为所欲为，而商股却处在毫无权利的地位。这些官僚视企业为“利藪”，任用私人，彼此争肥；一切官场上的贪污贿赂、浪费侵蚀、排场应酬等等积弊，都被他们带到企业里面来了。其次，官督商办企业是排斥商办的垄断集团。李鸿章在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提出“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的专利规定。这种垄断的结果，限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四）培植洋务人才

李鸿章在办洋务活动时，为了相应培植洋务人才，开办了一些学馆、学堂和医院，同时，还派人出国，学习各种现代科学技术。一八六三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学学馆；一八七二年起，先后挑选四批幼童赴美国学习；一八七六年派遣淮军部将卞长胜等七人前往德国学习军事，同年，又派学生分赴英德等国学习海军；一八八〇年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一八八五年又在天津设立武备学堂；一八八九年于威海卫、旅顺两地设立海军医院；一八九三年在天津设立海军总医院；一八九四年又在天津创办医学堂。以上这些学馆、学堂与医院，既是培植洋务人才的基地，当然又是李鸿章扩大淮系势力的工具。

李鸿章的这些洋务活动虽然并未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却使李鸿章和以李鸿章为首的封建官僚买办集团都成了“富甲天下”的人物，据容闳说，李鸿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而李氏家族在安徽的经济势力更是独占一方，“安徽

（芜湖海关）乃是李鸿章家族的特别牧场”；在安徽各城市，都有李鸿章的钱庄、粮仓和当铺。

总之，李鸿章所经营的这些洋务活动，无论是军火工业、海军建设，还是民用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教育，最后都失败了。洋务运动不仅未能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相反，它使中国在殖民地化的道路上愈陷愈深了。

洋务运动的失败当然是与中国当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会允许中国富强起来；同时，参与洋务运动的一些主要人物，如李鸿章者流，本身就是十足的封建买办官僚，这更使洋务运动带上了不可避免的先天痼疾，最后，终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挤压之下窒息而死了。

当然，洋务运动终究给中国古老落后的封建经济带来了一些新的因素，对于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客观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当时，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工业，建立新式陆海军，这些做法，本身并没有错。李鸿章在这方面的罪行，主要是他代表中国官僚买办阶级的利益，把办洋务的过程变成了同外国侵略者勾结的过程，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的殖民地化。

四、出卖民族利益的投降外交

李鸿章担任北洋通商大臣时，帝国主义列强正在加紧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处在一个严重的历史关头。但面对帝国主义的

侵略，李鸿章却提出了“外须和戎”的外交主张。他认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利器强兵，百倍中国”，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对于这些“强敌”，中国无法在疆场上取胜，“即暂胜必终败”。因此，他一味反对“轻言战争”，坚持“一意主和”；在军事上采取消极的不抵抗主义，在外交上大搞求降活动。

李鸿章是靠“武力”起家的，但他的武力只能对内，不能对外。在镇压人民起义中发展起来的淮军，和在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北洋海军，是李鸿章手中的两张王牌，也是他成为清王朝统治集团里举足轻重人物的“资本”。他最怕同外国侵略者打仗，唯恐失掉这张王牌。一八七四年四月，日本派遣三千军队进攻台湾，台湾人民英勇抵抗。当时，清政府曾调沈葆楨率海陆军前往增援。李鸿章担心战争扩大，清政府又要调动自己的军队出征，因此，连忙致函沈葆楨，劝他“自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一八七八年日本侵占琉球，驻日公使何如璋向清廷建议派兵船责问日本。李鸿章也从保存自己军事实力出发，竭力加以反对，胡说“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若再以武力相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无暇，亦且无谓。”在李鸿章这种卖国理论的指导下，遂使日本于一八七九年正式并吞琉球，并改琉球为冲绳县。后来，一位外国资产阶级评论家在评论这件事时指出，琉球事件向世界宣布：“富饶的满清帝国愿意任人宰割，而不愿用武力抵抗。”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有时不得不进行抗拒。这时，主战派也会在统治集团里占上风。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不得不被迫出兵应战。但他总要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军队避免与外国侵略者军队接触，尽量减

少自己的损失。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中，当法国海军开进马尾时，清政府曾命令李鸿章调拨北洋船舰增援福建。但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竟玩弄最卑鄙、最恶劣的伎俩，一面欺骗清政府说“北洋无船可拨”，一面令北洋海军全部驶入旅顺“避难”，清政府命令滇桂各军坚决抵御法军，不得擅自退后，而李鸿章却屡次电令潘鼎新不得进攻法军。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也采取了同样的投降主义军事策略。他先是幻想用消极的不抵抗办法，求得战争早日“收场”；后来，战争规模越打越大，李鸿章又把问题的解决寄托在西方列强对日本的“干涉”上，军事上一味采取应付态度，结果连吃败仗。

在投降主义军事策略的后面，则是政治上和外交上的乞降活动。例如，当中法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黑旗军与竹青等人所领导的云南农民军，曾联合越南义勇队，英勇抗击法国侵略者，并取得了多次胜利。但这时李鸿章却慌忙致电总理衙门说：“谅山已复 若此时平心与和 和款可无大损 否则兵又连矣。”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竟接受了李鸿章的投降主张，并委任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与法国议和，结果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不仅出卖了越南，而且也出卖了西南诸省的重大利益。军事上打了胜仗，竟然还要签订这样的卖国条约，这在外交史上实在是罕见的。再如中日甲午战争时，战争的硝烟还在弥漫，李鸿章便慌忙跑到日本求和。一八九五年三月，他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出卖了朝鲜，并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赔款二万万两，增设通商口岸等十二条款。马关条约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它大大地加速了中国的殖民地化进程。

李鸿章以为对待帝国主义侵略者，只要军事上不抵抗，外

交上忍辱求降，就可以阻止战争的发生，保住自己的淮军和北洋海军，从而保住自己的地位。但经过中法、中日等几次对外战争，李鸿章投降外交彻底失败了，他所控制的军事力量也遭到了惨重的打击，差不多完全崩溃了。

淮军和北洋海军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一开始就被当作李鸿章的私人财产，被培植成一支十分腐朽的军队。军队中的军官除少数爱国将领外，大多数都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他们对战略、战术和武器的使用等一无所知，除了吃喝嫖赌，别无其他能耐。他们“遇敌即败，败则逃走”。甚至尚未接敌，即先逃避。在这些腐朽无能的将领指挥下，成千上万的士兵，成了炮灰。中日海战结束后，李鸿章为了保住北洋海军，命令剩下的舰队全部藏入威海卫，并一再电令丁汝昌不得出洋与日舰作战，总以保船为要诀。结果日军进攻威海卫，将北洋海军围困于刘公岛内，北洋残余舰只十一艘全部被迫投降日本。李鸿章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北洋海军，到此亦全军覆灭。

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和一系列卖国投降活动，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国中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尤其是台湾人民，更到处张贴檄文，严正指斥李鸿章。檄文指出他不仅“将发祥之地、陵寝迫近之区割媚倭奴”，而且“又将关系七省门户之台湾，海外二百余年戴天不二之台湾，列祖列宗深仁厚泽不使一夫失所之台湾，全输之倭奴！”

李鸿章兵败辱国不仅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而且一度还曾受到清廷的贬斥。但是这个卖国贼却被帝国主义者所看中，把他当作是侵略中国的忠实奴才。一八九六年五月，俄国借尼古拉二世将举行加冕典礼的机会，公然指名要李鸿章前往致

贺。李鸿章到俄国后，又挂起了“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的招牌，开始新的卖国活动。不久，他即与沙俄大臣罗拔诺夫、威特等签订了中俄密约。这个密约规定中俄两国结成对日军事同盟，从而使沙俄在“共同防日”的幌子下，从中国攫取了巨大的权益。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等清廷最高统治者被弄得狼狈不堪。为了收拾残局，慈禧又不得不谕召李鸿章进京，向帝国主义列强乞求和议。一九〇一年九月，李鸿章等代表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大肆拍卖民族权利，致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总之，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末的近三十年间，李鸿章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出卖了无数的民族权利，这个曾被中外反动派誉为“大外交家”的人，实际上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大的卖国贼。